

喻园语言文学论丛

明清易代与话本小说的变迁

朱海燕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总序

学术研究,有两种境界。孟子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是学术研究的一种境界,在于“学问乃为己之学”,以学识和学术研究充实自我。又王阳明言:“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道固自在,学亦自在。天下信之不为多,一人信之不为少。”此是学术研究的另一种境界,在于“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欲至两种境界之一,应在学术研究中坚守宁静致远,以免荀子所谓“为学大病在好名”之病。然当前的学术研究,因了各种现实的欲望与制约,不无躁动喧嚣与过分功利。

秀美的喻家山阳,有一群默默耕耘于语言与文学圣殿的学术中人,有资深教授,也有青年学俊,教书之余,或以研促教,培英育才,或以研自娱,陶情冶性。不能言皆臻学术澄静之胜境,幸未染追名逐利之流风,宁静遨游,沉潜于思,自有心得,形诸文字,“成一家之言”。此“喻园语言文学论丛”编纂出版动力之所在也。本丛书,或论文结集,或学术专著,大体论析深微,新见

展现，自成体系，有裨学界。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丛书出版，只是起点，回顾留存，意后后来，寻幽探胜，学无止境。

丛书得以顺利出版，应衷心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尤其总编姜新祺先生及编审室诸位责编倾注了满腔热忱，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

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喻园语言文学论丛”编委会

内 容 简 介

本书在观照明清易代历史的基础上,考察了清初话本小说的变迁,它对话本小说传统的继承、贡献与超越。鼎革之际的小说家们,藉小说对易代史、对现实人生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反思,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反思的焦点集中于道德、人心。道德视角与道德关怀成为清初小说的共同特点,也是小说家们完成其社会职志的具体表现。

清初话本小说在艺术形式上的突破、在表现手法上的多样化和日趋成熟,是因为旧的文体形式已经无法满足新的需要——反映波澜壮阔的时代和急剧动荡的人心世态的需要。

与明代的话本小说相比,清初进入了一个更加自觉的创作阶段,作家的主体意识与作品的个人风格都比明人突出。清初话本小说整体呈现出显著的文人化倾向。文人化倾向并不妨碍作者贴近世俗社会、描写市井细民的喜怒哀乐,但是,作品的视角、风格、价值观和思想底蕴则是经过了“大传统”反复淘洗的文人的产物。就这个意义而言,清初话本小说是文人小说。

前 言

张岱《陶庵梦忆自序》云：“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骇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匱书》未成，尚视息人世。”宗子道出了明亡以后不少士人心系家国天下、发愤著书的隐痛。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的小说家们，罕能对此无动于衷。念兹在兹，或隐或显，是为易代之后话本小说创作的一大缘起。

本书第一章《引论》对清初话本小说产生和存在的时代因由、历史背景、发展状况及其与明代话本小说千丝万缕的关系做了必要的说明和论述。

第二章《清初话本小说的道德关怀》集中论述了这一时期话本小说上下求索的共同特点——强烈而执着的道德视角和道德关怀，以及从中折射出来的时代风貌、人情世态。

第三章《李渔，明清易代史的个案研究》，首先以李渔为线索，考察了明清鼎革前后的沧桑世变以及他个人与此相始终的身世经历。关于明朝末年的全面社会危机以及清初四十年的征服史，在该章第一节《沧桑巨变中的命运轨迹》中有大略的介绍。需要说明的是，这部分背景针对的是清初的所有小说家及其作品。考虑到李渔的一生正好跨越明清两代，他的重要活动时期恰好与清初的四十年大致重合，他既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又匍匐辗转于其间成为其中的一员；他无权无势、无力干预历史的进程，却在与上层、中层的大小官宦、社会名流交游往还的过程中，关涉到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当然，他还具备其他清初话本小说家所没有的一个优势，即：他留存下来的个人资料最为翔实丰富，在勾勒出他本人生活历

程的同时,还提供了了解清初历史的大量信息。对清初的历史作梗概式的交代,是希望将小说家们生存的大环境及其写作的时代背景呈现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中去体会、理解小说家、他们的作品及他们对历史的反思。

其次,在清初士人群体分化的时代语境中,照察处于儒家传统经验与现实困境的夹缝中的士人,其生存之道的复杂、艰难和必然的狭窄;通过对同时代其他人物“出处”经验的参考比照,探究了李渔独特的生活方式及其在著述中对自我形象有意识地塑造等问题。李渔身世遭际的丰富复杂——朝代更替、社会剧变等因素对他个人的深刻影响,以及他对此的回应,为研究明清易代的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典型个案,这正是许多历史学家对他如此着迷的原因所在。人,作为社会的存在,在兼顾其社会属性与个性需求的情况下,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生活道路?李渔自身的困惑以及围绕着他身前身后的是是非非,从一个侧面说明传统文化为个体所能提供的生存空间何其有限。这部分研究尽量以易代的历史巨变对个人生活轨迹的影响为背景,涵盖了李渔的全部著作,力图为进一步研读分析他的话本小说提供一个全景式的介绍。李渔,不仅以他的小说、戏曲和其他著作,更以他的行为方式、生存经验,书写、记录了明清易代的历史,他与他的作品一道构成了易代史的一部分。

在此基础上,第四章着重从易代史和小说史的角度,考察了李渔的话本小说集《无声戏》(包括《连城璧》)和《十二楼》。一方面,侧重于发掘其作品对话本小说传统的创新和变革,包括:小说中鲜明的个人标记、喜剧风格及其与自我形象之间的关系,其小说观念对道德的强调,基于道德和喜剧的双重考虑而设计的“道德喜剧”——它的基本形式、讲述方式与结构特点,对传奇、八股文等文体结构的借鉴,小说语言方面的成就,以及在这些创新背后隐藏着李渔的个人形象,等等。李渔扬弃了话本小说固有的种种“窠

白”，为适应自己的表达需要对小说形式加以变更，创造了能够经济有效地表现其道德主旨和喜剧风格的讲述方式，以及与此相匹配的人物刻画、情节编排和背景描写等。通过上述分析，观照李渔话本小说独树一帜的风韵，及其在话本小说由明而清的变迁历程中所起到的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透过这些喜剧作品嘻笑调侃的表面，去发现它们与易代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在表面看来无所用心的喜剧中，笠翁也从来没有忘记对现实的关注。不过，要想从李渔的小说中找到对易代巨变的直接描述，恐怕是枉然。他在处理这类题材时的小心、谨慎，隐隐传达出言不由衷或不写之写的弦外之音。所以，他的小说终于只能流于嘻笑、甚至是为笑而笑的油滑，未尝不含有时代的宿命在其中。

艾衲在话本小说史上的岑寂，与他对这一文体的卓越贡献相比，反差实在太大了。如果说对李渔小说的评价不高，是因为它的浅薄和俗气；那么，艾衲遭受的冷遇，则是由于其小说思想内涵的深刻复杂和小说观念的超前。《豆棚闲话》极大地改变了由三言开创的话本小说的文体形式和传统的小说观念，对读者根深蒂固的阅读习惯是一次强烈的挑战。艾衲尝试以白话小说的形式来表达深邃而沉重的哲学思考，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由明清易代引发的对天命、道德、果报等一系列观念的本质的探讨和批判，对此，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却没有强加给读者。《豆棚闲话》提供了一种需要深入思考的开放式阅读体验，它希望与读者展开严肃的思想交流，而不是单方面的喋喋不休的说教。在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上，他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天地，因而极大地拓宽了话本小说的文体边界。《豆棚闲话》与《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道奏响了中国古典小说最为华美绚烂的乐章。第五章《艾衲与〈豆棚闲话〉的意义》藉着深入细致的剖析，对这位杰出的小说家及其作品表达了由衷的敬意。

最后一章,就清初话本小说的总体创作情况,及其对明代话本小说的继承与变革等,进行了总结。

与明代的话本小说相比,清初进入了一个更加自觉的创作阶段,作家的主体意识与作品的个人风格都比明人突出。对明清之际历史的反省、对清初社会现实的关注,以及为适应此表达需要而对文体形式的诸多革新,使清初话本小说整体上呈现出显著的文人化倾向——作品的思想倾向、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等,无不体现出文人阶层特有的情趣、韵味和价值标准。文人化倾向并不妨碍作者贴近世俗社会、描写市井细民的喜怒哀乐,但是,作品的视角、风格、价值观和思想底蕴则是经过了“大传统”反复淘洗的文人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初的话本小说是文人小说亦无不可。

目 录

第一章 引论:易代背景下的清初话本小说	(1)
第一节 纷然杂陈的易代变奏	(2)
第二节 持镜自照:清初话本小说一瞥	(14)
第二章 清初话本小说的道德关怀	(22)
第一节 概说	(22)
第二节 浊世中的清醒者:《醉醒石》	(27)
第三节 酌玄亭主人与《照世杯》	(38)
第四节 历史反思中的道德视角及道德关怀	(51)
第三章 李渔,明清易代史的个案研究	(65)
第一节 沧桑巨变中的命运轨迹	(65)
第二节 生活方式:两难选择外的第三条道路?	(91)
第三节 李渔式的表达方式与自我形象的期许和 塑造	(106)
第四章 易代史、小说史视野中的李渔的话本小说	(118)
第一节 李渔的话本小说	(118)
第二节 守成与创造——《无声戏》、《十二楼》内容 研究	(133)
第三节 自我作古——《无声戏》、《十二楼》形式 研究	(154)

第五章 艾衲与《豆棚闲话》的意义·····	(181)
第一节 作者与小说的版本·····	(181)
第二节 反省与小说批判:解读《豆棚闲话》·····	(186)
第三节 话本小说传统的超越——《豆棚闲话》 形式研究·····	(212)
第六章 结束语:清初话本小说与前代小说传统·····	(226)
参考文献·····	(235)
后记·····	(244)

第一章

引论 易代背景下的清初话本小说

1644年5月,多尔衮应吴三桂之请打着义师的旗号入关,迅速地从李自成手中夺取了北京的控制权。在短短四十几天的时间里,北京,这座象征着皇权的古老都城三易其主。10月,福临定都北京,改元顺治。这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开始了。然而,历史的进程绝非像某个标志性事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斩截利落,它既包括了此前若干年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酝酿、积蓄、演化,也直接影响到其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后续发展和变迁,直到下一个转折点的出现。对清初历史而言,它的起点早在占领北京和改元顺治之前就埋下了,如果没有明末经济的衰颓、政治的败坏瘫痪、社会秩序的颠覆、满洲的军事崛起等众多方面的充分“准备”,历史很可能就不是后人所看到的样子了;而从福临入主紫禁城到康熙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康熙二十二年,即1683年),清朝统治者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上,以武力肃清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抵抗、叛乱,为新的帝国政治的正常运转扫清障碍;同时,一套吸取了满、汉统治“精华”的政治制度在经过不断的试验磨合后也趋于成熟,而逐步定型。这便是为清朝二百多年统治打下坚实基础的清初四十年。

第一节 纷然杂陈的易代变奏

要探究清初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应该而且只能到明末社会中去寻绎,到当时各种错综复杂、交相作用的历史变动过程中去发现。学术思想的嬗变提供了这样的窗口。明末以还,思想界的辩难、纷争和诸多变迁,丝毫不亚于社会生活领域的风云变幻;它本身的发展过程,既是对时事推移所做的积极反应和适度调整,也忠实地记录了易代前后政治、经济、文化、民情、风俗、人心等的沧桑变化。

明末东林诸儒的崛起与振作,不仅有意在学术上矫正王学末流的积弊,客观上亦开清代“实学”风气之先河;而且,东林人士对现实政治的关切,使得他们的学问与政治理想合为一体,也就是说,学术思想必须为实际的政治斗争服务。明乎此,才能深入地理解何以东林巨擘、复社名流都曾经那么深地涉足于明末政治生活的漩涡之中,轮番占据了政治舞台上最显著、最耀眼的位置。套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话,即:明末东林一流的儒士“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的。这也正是易代之际学术思想的精义所在。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以东林诸儒对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辩难为明代学术思想转变的一大契机。东林人士有感于“无善无恶心之体”已沦为“伪良知”的口实,俗流“以虚见为实悟,终日谈本体,不说工夫,才拈工夫,便以为外道”,^①终致混淆视听;因而,痛下针砭,强调“工夫”、务实。高攀龙所谓“不患

^① 顾宪成引罗念庵、王塘南语,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

本体不明,只患工夫不密”,^①史孟麟所谓“有本体自有工夫,无工夫即无本体”,^②均可视为东林一派学术的宗旨所在。从这一点即可明了东林与王学的学术分野,这一分野同时也决定了后来清初学术风气的基本走向。

东林人士对工夫、实行的强调,显然有其着眼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即:对明末朝野上下混乱颠倒的社会状况有所匡救,以实践其作为儒者的政治理想。随着明末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这种认识逐渐成为仁人志士的共识,不复为东林一系所独有。所以,明清之际彪炳史册的大儒,无不是身体力行地践履其思想的实践者,没有谁能够置身于水深火热的事世之外,缥缈虚无地坐而论道了。小说《醉醒石》第二回《恃孤忠乘危血战,仗侠孝结友除凶》,谓“不遇盘根错节,无以别利器;不值时危国乱,无以识忠孝”,道出了危难关头之于人的考验,可谓深得东林之精神。

这种务实的精神,直接影响了众多士人的世界观、人生态度和生活道路,并且见诸言论著述。这从黄宗羲对“儒者”使命的期待中可见一斑:“儒者之学,经纬天地,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阡扞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徒以‘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之阔论,铃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为立功建业,别是法门,而非儒者之所与也。”^③他将此认识贯彻于毕生的事业之中,进而为经天纬地之事功,退而能学贯古今,于经学、史学、天算

^① 《明儒学案》卷五十八。

^② 《明儒学案》卷六十。

^③ 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卷三《弁玉吴君墓志铭》,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二章《黄梨洲》。

地理之学无不精通；他的政治蓝图最后汇聚成《明夷待访录》一书，对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创设都提出了具体而深入的构想。黄宗羲的一生证实了他对“儒者”使命的期待绝非过高，而是具有可行性的，尤其突显出非常时期儒者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形象。

易代，恰好为儒者提供了一个检验其学识定力、磨炼意志和最大限度地实践其人生理想的空间。黄宗羲与一时的大儒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固然标志着易代前后儒者学行合一的典型，但这并不说明他们所代表的思想境界曲高和寡，应者寥寥。即便在学识、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远逊于此等大儒的普通士人中，也时时会听到类似的声音。以面向世俗社会的小说为例，明末以来出现了不少在题材、内容、主题与风格上以现实性为指归，体现出鲜明的务实倾向（有时候甚至是过于务实）的作品。《型世言》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者陆人龙既已强调其创作的宗旨在为世人提供行动的指南，又将该宗旨贯穿于整部小说的写作之中，通过对种种丑恶的世态人情的揭露而最终落实为对正统道德规范的提倡和维护。小说正文中随处可见的议论，以及每篇开首的小引、结尾处的回末评等，都表现出作者、评论者热切的现实关注，他们对时局和各类社会问题的看法，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尽管表述的文体、方式及其认识的深度，与顾、王、黄等人相比，在当日的人们看来，有高下精粗之别，其立意则基本一致。在《型世言》之后，还有《清夜钟》。因为正当崇祯殉国、世事糜烂而至于不可为的境地，《清夜钟》的现实关注实较《型世言》为更烈，措辞的激烈、情绪的愤然不平，都跃然纸上，作者恨不能直接从纸上走下来振臂高呼，唤醒痴顽混沌的世人，挽狂澜于既倒。这也使后人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非常时期的真情倾泻。

虽然以《型世言》和《清夜钟》这样鄙俚浅俗的小说比附大儒们的思想，在某些儒者看来，未免不伦不类，有冒犯先贤之嫌；但是，它们明白无疑地显露出来的现实关切，在客观上与大儒们认识的

契合一致,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的。这大概也是时代风气转变时一种不期然的反映吧。

当务实黜虚的思想抬头时,“文”的定义就有必要重新加以辨析厘正。顾炎武即认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①这种“文”的观念,显然是与经世致用的要求相一致的。其“有益”之文界限的严苛,源于沉重的家国之痛,源自对明亡原因的清算。顾炎武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②清谈玄言之祸而至于亡国,这是顾亭林一类的

① 《日知录》卷二十一《文须有益于天下》。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三》中又称:“愚不揣,……凡文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检视其著述,确实都是有为而作。例如其《音学五书》,一般人会疑心它与明道、救世有何关联。依照顾炎武本人的说法:“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于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他撰写《音学五书》,意在“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曷而不可乱。自是而六经之文乃可读。”(《音学五书》序)钱穆总结《音学五书》的意图为:“故治音韵为通经之钥,而通经为明道之资。明道即救世。……三代六经之音,久失其传,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有改经之病。”则亭林著此书是为了恢复经典的原貌,而“经”与道、与救世的关系自不待言。

② 《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儒者所无法宽恕的，更何况胜国沦亡的惨痛犹在目前，无法释怀。按照“文”当以明道救世为务的标准，不惟空谈心性的文字在废黜之列，诸多抒写性情、陶冶娱乐的词曲、小说、戏曲等恐怕都难以幸免了。尤其是重在娱乐、消遣的小说，不但所写之事大抵“怪力乱神”，且多“无稽之言”，自然首当其冲。

话本小说的娱乐性，乃其与生俱来的禀性。在《清平山堂话本》、《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等早期话本小说中，娱乐性不仅先于教育性而存在，而且事实上已成为当时小说最重要的功能。与“三言”等后来的文人作品相比，早期话本小说具有更加浓郁的民间趣味，具体表现为：娱乐功能在作品中占据了首要地位，相形之下，教育的意味就非常淡薄了；单就娱乐功能而言，它的范围也相当狭窄，仅限于满足听众或读者的好奇和感官方面的刺激；听众或读者在听完、读完之后，究竟能得到多少精神上的愉悦和提高，则不是早期作品所考虑的问题。到“三言”以后，由于文人作家的参与，话本小说的整体风貌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首先，小说的教育功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冯梦龙直“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①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虽然这种推尊是否获得了主流文化的认可，还颇存疑问——自此以后，话本小说作者们大都奉此为圭臬，努力强化其作品的认识、教化功能。其次，小说的娱乐功能得到了拓展和提升。所谓拓展，是指在原有的较为低级的感官刺激之外，不断开掘、培养并设法满足人们在审美、情感、认知等方面的高层次需求，从而使话本小说的娱乐性因素提升到了一个更高、更雅的水平。杰出的话本小说家，如“三言”、“两拍”的作者们，总是在创作中致力于平衡娱乐和教育之间的关系，使二者能够相得益彰地并存于作品中，在保持读者阅读兴趣的同时，给予适当的教育和提高。

^① 《醒世恒言叙》。

这种情况到《型世言》及稍后的《清夜钟》等小说中,有所改变。因为这些作者对实用、教化和救世等主旨特别强调,希望以小说作为唤醒民众、共赴国难的济世工具,相应地就忽略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竭力排斥小说理应具备的娱乐功能。一来小说中的娱乐似乎跟当时紧张而严肃的时代氛围不太协调,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还有心思嬉笑取乐,本身就属犯忌;二来这类作品大多以苛刻严厉的道德伦理准则相标榜,其中推奖的生活方式也不无偏激峻厉之处,而跟娱乐相关的轻松、愉快、适意等情绪显然与此大有妨碍,自然在摈斥之列。对小说娱乐功能的排斥,可以看作《型世言》、《清夜钟》诸小说对包括学术风气在内的时代变迁的一种直接反应——当生存成为第一要义的时候,已无暇娱乐了。这不仅在这些小说中可以感受到,就是在其他各种文字中同样可以感受到——从言辞的严肃急迫,句子节奏的紧凑,语气和语速的变化上,都可以体味一二。这已经不是少数人个别的主观行为,而是由时代氛围所共同决定了的。

这大概就是为儒者所慨叹的末世之音吧——“噍杀”、“杀气”、“戾气”,在其背后是士习的普遍躁竞、褊急、苛酷和偏激,以及随处可以感受到的空前紧张的人际关系。一时的东林、复社中人即斤斤于“是非”之察,不免疾恶太甚,门墙过峻,乃至酿成党祸。论者遂以此近于极端的严厉作为仪型世范来推举,几使生人无立足之地。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二十七中对此类风习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翹然自好者,以诋讦为直,以歌谣讽刺为文章之乐事,言出而递相流传,蛊斯民之忿怼以诅咒其君父,于是乎乖戾之气充塞乎两间,以干天和而奖逆叛,曾不知莠言自口而彝伦攸斁,横尸流血百年而不息。”王夫之洞察了苛酷、躁竞之于世道人心的戕害——它变相地鼓励了诋讦、杀戮和荼毒,甚至使人普遍偏离了人性,残忍嗜杀而浑然不觉。这些在《型世言》和《清夜钟》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作者、评论者持论之严、之窄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